

第二章

歧途，江防舰队司令部

说起日语这门功课，我可是呱呱叫。为了不挨耳光或少挨板子，我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夫。那由一大堆四不像的符号（假名）组成的文字已经完全被我掌握，任你如何变换结构我都能毫不费力地将它念出声，表出意，一丝不差。这都归功于那个“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当时叫做“执政”）。他听命于“太上皇”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在所有的学校里开设日语课，而且是主课。

记得高小一年级时第一个教我们日语的老师是日本人，叫石黑；另一个老师是出身“关东州”（今大连市）公学堂人称二鬼子的朝鲜人，姓田。

这个石黑先生小个子，罗圈腿，母猪眼，梳着溜光锃亮的中分发，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日本人。他黑色洋服笔挺，硬领衬衫刷白，倒满有“国际文人”的仪表。最令孩子们不解的是他老在脸上扣着个“马斯库”（口罩），像个马粪兜似的玩艺儿。于是大家认定，这小鬼子不是没鼻子就是天生的豁

嘴儿！

他的“威严仪表”不但孩子们见而生畏，就是校长和其他老师们见到他也都躲躲闪闪，敬而远之。

有一次上日语课，石黑先生指着鼻子让我站起来，朗读黑板上挂着的五十一个片假名（正楷字母）。我吓得腿肚子转筋，但仍一口气把那些字母通读了下来。石黑露出满意的微笑，一声“腰西”示意我坐下，一面又叫起了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叫徐子英，他结结巴巴还没读完第二行字母，下课铃就响了。照惯例，孩子们这时要听班长口令，一齐站起来向老师鞠躬，再解散。但就在这时，一声啪的摔桌盖声音炸响在徐子英面前。本来就嫌他读得不好的石黑先生立刻被激怒。他大步走到徐子英跟前，用日语厉声问他为什么摔桌盖，接着便轮圆了大巴掌向徐子英同学脸上扇去。这孩子倒是反应快，身子往下一缩坐回了椅子上，让石黑这沉重的一击落了空，整个身子像陀螺似的转了一圈，险些闪个跟头，“马斯库”也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像熟透的草莓似的大酒糟鼻子，逗得孩子们哄堂大笑。这下坏了，暴怒的石黑咆哮一声扑上去，一手抓住徐子英的脖领子提起来，一手左右开弓扇起了大耳光。孩子们全吓傻了，变得鸦雀无声，一个也不敢动。在劈劈啪啪的耳光声中，徐子英同学的口鼻流出了鲜血……可能是有人溜出去报告了校长，那个姓田的二鬼子老师和校长一同赶到了教室，连连向石黑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并且罚徐子英整个下午面壁跪在走廊里，没石黑的赦令不准回家。

徐子英同学在全校小有名气。他年龄虽然与我们差不多，但体格较高大、粗壮，比我们高半个头。他鼻子长得挺大，又天生一头带卷的黄头发，乱草似的蓬着，同学们送他

个外号“二毛子”，意思为仅次于或者有点像俄国的“老毛子”。其实他父母都是地道的山东人，他妈还是个“小脚娘”，大家全认得。

这个徐子英胆子大，又聪明又淘气，闹鬼、作妖花样百出。开学典礼那天，礼堂里的各种仪式、训话完毕，校长陪着日本人教育局长畸田和“满洲人”副市长去参观粉饰一新的教学大楼。哪知一进楼门，一股奇臭便扑鼻而来，众人不由得一齐掩鼻止步，几位女士不禁干呕起来。然而眼前的走廊窗明如镜，墙壁、顶棚雪白耀眼，一尘不染，新油漆的淡绿色墙围闪闪发光，无可挑剔……这令人恶心的臭味又是哪儿来的呢？校长又慌又愧，冷汗直流，派人到处寻找。楼里院外，既无掏粪车又无污染源，弄得大家垂头丧气，把一个庄严隆重的开学典礼弄得不欢而散。事隔一个多月，徐子英才向小伙伴们透露，那天熏走鬼子局长的“毒气”是他放的。方法极其简单：那天，他用吃早点的钱买了几块臭豆腐用油纸包着，趁畸田讲话时，假装上厕所溜出礼堂，到教学楼里顺着墙根一溜跑，将臭豆腐均匀地涂抹在墙围上。由于臭豆腐的颜色与墙围的油漆极其相似，加之抹得又匀又薄，基本看不出来。眨眼功夫，几块臭豆腐用完，臭气立刻弥漫了整个大楼空间，历时一个多星期，其味才淡。事后，徐子英跑到厕所洗洗手撒了泡尿又回到礼堂座位上，没事人一样。这件疑案，如果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福尔摩斯也破不了。当然，小伙伴们谁也没说出去，只是心中对他十分折服、敬佩，遇事常找他讨主意。这回摔桌盖，就是他对强迫学生学日语的“有声抗议”，虽然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但同学们看到徐子英脸上始终明摆着的“不服”两个字。下课铃一响，大家拥出教室，立刻发现跪在墙角的徐子英不见了。

在他抹过臭豆腐的墙围上留下一幅用小刀划出的漫画像：中分头，母猪眼，寥寥几笔便将石黑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墙上，不过耳朵奇大与猪无异；扣在脸上的“马斯库”已幻化成了猪拱嘴——整个一幅“东洋八戒”像！此事马上轰动全校，小学生们奔走相告，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赶来参观，像看画展一样盛况空前。等校长发现时，全校几乎人人都参观完毕了。二鬼子田老师找来工友，对这幅杰作又刮又抹，最后牺牲了半米见方的墙面，才算捣毁了石黑的肖像。

第二天，学校便贴出了开除徐子英的布告。其实这已是多此一举了，从那往后，徐子英同学就再也没有在学校露面。

我们长大以后，常常提起这个孩提时代的小英雄。有人说他流浪到苏联去了；有的说他跑到长白山森林里参加了“抗联”……最后的一个确切消息是：他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前夕，随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冲到哈尔滨市郊的太平桥一带，与日军激战时壮烈牺牲。听说他当时身穿苏联红军军装，肩上是上尉军衔，年仅二十五岁。

与他相比，我十分惭愧，因为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小洋奴了。

国高二年级时，一年一度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举办的日语测验考试，我竟得到“三等”合格证书。全校六百多人，合格者只有七个。每天晨操仪式上，我们这七个出类拔萃的“小秀才”（也有人叫我们“小汉奸”）一字形列队于校长讲台前，聆听校长的夸奖和吹捧，然后趾高气昂地归队。到国高毕业时，我已经拿到了日语“二等”证书。

这次去海军司令部应聘，我觉得挺有希望。司令部（全称为：大满洲帝国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大楼坐落在哈尔滨

市道外区北七道街的松花江畔，是一座距江边三十余米，红砖砌成的三层大楼，楼顶飘扬着五色彩条的“满洲国”国旗，面对着宽近千米的浩浩松花江，好不威严肃穆。大楼四周百米之内行人车马严禁停留。高台阶上两侧木棍般地立着两个大枪崭新、刺刀雪亮的卫兵。一般人想进楼内办事，在十几米外就得先脱帽打招呼，说明来意，方可走进敞开的大厅正门。

我那天一身学生打扮，小分头没抹油也梳得刷齐，手里拿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两枝钢笔插在制服上衣兜里，甩开锃亮的皮鞋大步踏上台阶。我向卫兵说明是来应聘的，便顺利地进入了门厅，由一个戴着无沿海军帽的班长模样的上官引路上了二楼，走进一个像会议室似的大房间。里面已有二十多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大约有四五个年轻女士。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军官招呼我，递过一张表格式的纸片，上面印着姓名、年龄、学历、住址等项目。这时候，又走进来三男一女，全都西装革履，油头粉面，香气扑鼻，也是来应聘的。

九点整，考试开始。那个中年军官告诉门口的卫兵把门关上，意思是晚来的取消考试资格了。考试很简单，那个日本军官说，你们把我念的文章听完抄写下来，再翻译成“满文”（其实他指的是汉语。因为真正的满文是那种螺旋状竖条的少数民族文字，极少有人认识。当时的日本人为推行奴化教育，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严禁东三省老百姓自称中国人，而应称“满洲人”，汉字也被说成“满文”了）。限四十分钟交卷，然后即可到邻室面试。他用日语把一张报纸上的一小段日本战争新闻念了两遍。我匆匆抄下并译成了汉语就想起身。环视周围，那些人大都在奋笔疾书，也有的东张西望，抓耳挠腮，苦思冥想。一位衣着时髦的女

士，匆匆把考卷塞到那位军官手中后，便拿起小阳伞大步流星直奔门边立着的大卷柜而去，一把抓住柜门把手就拼命往外拽，可惜柜门上着暗锁，不然非一头钻进去不可。这位一心想当头名状元的女士闹了个面红耳赤，正不知所措时，我已经交了卷子，捷足先登了。

在另一个屋子里接待我的是日、“满”各一名军官。日语的问话全是唠家常，闲扯一通，看来只是测试我的日语发音如何。那个“满洲”军官有四十多岁，挺和气的，用中国话又问了我些家庭情况便微笑着告诉我可以走了，回去等候通知。

开门出来，那个冒失鬼女士正夹着小阳伞站在那里仔细打量着这扇门呢。

考试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我家住的大杂院门前。车上走下一位二十多岁，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张纸条的漂亮小伙子，后面跟着一个穿海军士兵制服的中年人，可能是司机，喊着我的名字“左奇峰”直奔而来。我立刻明白，自己“高中”了，忙迎了出去。握手寒暄一通，他很客气地谢绝了入室的邀请，递上了纸条。上面除了要找的地址外，是中文两句话：左君，你经考试合格，准备录用，请速来本部面谈。署名：王××。我把事情仓促地告诉了家里，便随来人登上了汽车。在汽车里与这个年轻人交谈中知道，他也是翻译员，毕业于吉林国高，只比我早来三个月。他友善地对我说，你可能被录取了，月薪每月可能给五十元上下，我看就可以啦（当时的物价水平，月薪三十元就可以养活五口之家）。但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是出于嫉妒在对我扯谎，他的月薪从来就是六十元！

十分钟后，汽车便从司令部的后大门驶入了楼院，由这

位年轻人带领直接进入了一个约三开间大的办公室。第一个接见我的正是那天口试的上尉王副官。他今天服饰鲜明、整洁，一身笔挺的深蓝色海军将校服，从领下第一个扣子连到右肩上是一挂银光闪闪的“参谋带”，显得十分威严、气派。他笑眯眯地站起来招呼我，示意我坐下来。说等一会儿给你介绍这里的副官处长福岛，然后再领你去见人事参谋，定你的薪水。并悄悄地对我说：“你可以要每月六十元薪水，记住，少给不干！”说完冲我挤了下眼睛。

勤务兵刚刚给我上了一杯茶，一个瘦削得像“木乃伊”的军官走了进来。比刀刃宽不了多少的脸上却蓄了一撮浓密的牙刷胡，和王副官一样也挎着参谋绶带，领章上两道金线一个五角星花告诉我这一定是副官处长日本人福岛无疑了。在他毫不在意地扫了我一眼的同时，我已刷地站了起来，深深向他鞠了一躬。

“是翻译吧？叫什么名字，什么学校毕业的，多大啦？”福岛边问边懒懒地坐进办公室正中的圈椅中，听我回答后，又笑着说了一句：“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然后转脸对王副官说：“去看看池田参谋在不在，领他去见见吧。”我再一次向这个日本长官敬礼，跟着王副官来到了相隔两个房间的参谋处。这是人事参谋一个人独用的办公室。

王副官敲了两下门，听到“进来”的应声，便示意我稍候就自己先进去了。不到一分钟便开门向我招手，让我进去。转过一个小小的木制屏风，只见一个五十多岁、领章是两道金线二颗星花的老人坐在那里。我的新皮鞋咔的一声响，敬礼后笔直地立在桌前。王副官介绍说：“就是这小子。打算录取他，你看怎么样？”“是吗，福岛同意吗？”“二十七个人中，我们认为这小子最合适……”

于是这老头便提出了刚才福岛问过的一套话，不过是考查一下我的口语。看来无可挑剔，他点点头，顺手抽出一支烟，边划火柴边问我：“你小子打算要多少俸给（薪水）？”我望了一眼王副官，他笑着不表态——刚才已经关照过我了。于是我谦恭委婉地回答：“承您厚爱，我家境不太宽裕。能给我与同辈差不多的薪水就非常感谢了。”这位手握人事大权的人物今天似乎心情挺好，在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之后，对我说：“小伙子，好好干。”同时在一张纸条上草率地写了几个字，交给王副官，挥挥手便打发我们出去了。这里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十多分钟的会见接谈，老家伙一直没睁开眼睛，眼皮一直下垂，听说日本大人物大多如此高傲姿态，以示尊严。

在走廊里，王副官边走边用左手竖起大拇指和小指向我示意“六”。直接又把我带到了主计处（军需财务部门）报到。当他把纸条摆到一个姓袁的上校处长桌上时，我扫了一眼，见到了几个日本字：“定月薪六十元，即日算起，池田。”

我在向袁处长敬礼的同时，已在心里断定，这是个大烟鬼。其人骨瘦如柴，脸色惨白，一副没边的高级眼镜后边是一双死鱼般青里泛黄的眼珠。他主持的这个部门在阔达百米的大房间里，大小官员、打字员、勤务兵有数十人，几十张桌子排得满满的。其中日、“满”人约各占一半，有军人也有便服、西装的雇员，五个打字员（三日二“满”）则全是擦胭抹粉的年轻女士。随着我的出现，咔咔的打字声好像稀稀拉拉地逐渐全停了下来。几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地向我身上聚焦，盯得我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直到随王副官走出门外，我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接着便是一系列的必办手续，照相、按指纹。一个胖墩墩的小个子书记官用一架崭新的照相机将我的正面、侧面、半身、全身照了个遍，摆弄得我滴溜转。后来，各种证件发到我手中时，我才看到这家伙的“杰作”实在不怎么样。照片上的我又笨又傻，木偶一样。不知是我当时太紧张还是这位摄影师技术太差，总之这套照片是我平生最糟糕的留影了，真白瞎了那架照相机，那可是德国产的名牌货——莱克！

在这个庞大而又特殊的军事机关里，只混了两个来月我便适应了这份差事，不但眼界大开而且如鱼得水。学校里推行的奴化教育使我自己创编了一套“新马屁经”，并且不断在实践中进行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整日穿梭在日、“满”军官、士兵的洪流中，大江两岸，楼上楼下，官场和市井，不知不觉地我已变成一颗麻将桌上的骨牌“混子”，摆在哪儿都挺管用，且人缘颇佳。

“海军司令部”这个名称是伪“满洲国”建国初期对这一军事机构的原始称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奉军败退。当时奉天海军副司令沈鸿烈及参谋长兼江防舰队司令官谢刚哲等人携带公款及重要文件化装潜逃，不知去向。致使三江水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上的大小军舰“群龙无首”，不知所归，人心大乱。一时间，各舰自行其是，仗着有枪有炮变成了武装货船，流窜于沿岸码头，私运鸦片、土特产，中饱私囊。当时这支失去统领的武装力量曾引起苏、美、日及奉军的重视，不断有人在暗中拉拢、策动，企图收归己有。而各舰上的奉军残余则骑墙观望时局，态度暧昧。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满洲国”

宣告成立，在大汉奸张景惠大力提倡所谓“自治运动”的情况下，原奉系海军补充队大队长尹祚乾投靠日本关东军海军军部，受命整顿这支水上部队。尹祚乾多方奔走、游说，设法统一了内部，使这支部队归顺，宣誓效忠“满洲国”，尹祚乾遂被任命为“大满洲帝国海军江防舰队”首任司令官。

这支部队全部为海军建制。从服装到武器装备都与正规海军一样，但却与大海不沾边。它的任务是负责黑龙江、松花江上的军事防务，其敌对目标就是苏联。

这支部队直属于伪满的治安部（后改称军事部），是一支独一无二的特殊部队。在建立初期，除一部分张大帅（张作霖）时代留下的破烂炮艇外，尚有几支由江上运输货船改装成的武装巡逻艇。其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且与苏联在



舰队司令官尹祚乾（右）与日本军政部大臣合影

黑龙江边境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这支部队就逐渐被扩充发展起来，从1932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已拥有大小舰只三十余艘、人员三千余人。其中由日本三菱造船所制造的几艘大型军舰顺天号、养民号和定边号、亲仁号排水量分别为二百七十吨和二百九十吨，是由日本将船解体后用火车、轮船运到哈尔滨再重新拼装后下水服役的，并由这四艘大型军舰组成第一舰队（主力舰队）。江防舰队分别在哈尔滨、佳木斯、富锦、黑河等地建有军事基地、仓库及修船厂等设施，形成了一条水上军事防务体系。这支部队的军官有三分之一是日本人，他们是部队的真正掌权人，是说了算的。这些日本人多半是日本海军的退役军人，也叫在乡军人，年龄一般比较大。年轻一些的则全是上前线体检不合格者。三分之二的“满洲”军官则差不多都是来自南方沿海省份的军阀残余。原来当过大官的，来到这个正网罗人才的新政权里当然也能捞个大官做，是名副其实的招降纳叛。只有士官和大兵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这些人中，有小学文化的即可当上班长，其余的则全是些不愿意当工农、苦力的社会流氓、地痞、胡子（土匪）兵。

由上述这些人物组成的乌合之众，其素质、档次可想而知。所以，这支特殊的部队，这群服制不同于一般“国军”的丘八老爷们闹妓院，砸剧场、茶肆酒楼，打架斗殴，就成了家常便饭。由于是“新京”（长春）的直属部队，门头硬，宪兵管不着，所以这些戴着无沿海军帽、脑后拖着两根小辫子（飘带）的大兵们便自视高人一等，什么宪兵、警察等等全不放在眼里，其他阶层的老百姓就更不在话下了。

司令官尹祚乾绰号“尹大胡子”，并非长着满脸大胡子。胡子倒有，并不太多，而是指其言行与“胡子”（土匪）一

样，故此得名。这些丘八们有司令官“尹大胡子”在为他们撑腰，就更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了。水兵在外边闹事，如果打了别人，不管他是谁，这位司令立刻拍案叫好。如果吃了亏，他就要扇来报告事端的人大耳光，大骂：“蠢种！混蛋！再给我出去打，出事我兜着！”

在这种怂恿、训导下，水兵们走在街上个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每当巡航归来，水兵上岸，便如展翅的蝗虫般飞扑市区灯红酒绿之处，吓得百姓胆战心惊，人人敬而远之。而一些市井无赖则以交上水兵朋友为荣，勾肩搭背出入妓院、酒楼，仗势欺人，为非作歹。

这位尹大胡子司令，官衔是海军中将。参谋长是少将。记得是在我上班四五天以后，也是由王副官特意带我去谒见了这两位名义上的本军最高长官（其间，我曾在早晨上班的礼号声中，从远处看见过这位司令官）。司令官室在二楼最东头与参谋长室相邻。这两位高官空有头衔，并无实权。整日在礼号声中上班下班，喝茶、读报、聊天，谈些社会上的奇闻怪事解闷。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海军的日本人将校手中。当王副官带我进入司令室的时候，两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正在海吹神聊着当年军阀生涯的威风和业绩哩。听了王副官的介绍，尹司令摸摸秃头，又捋捋那把灰白的胡须，便用他那难懂的湖南话与我扯开了家常。他对我的名字大感兴趣，评论了半天。最后，前后左右地又把我端详了个够，挺起肚子喝了声彩：“好，很好！以后有机会非把你小子送日本去深造不可！”

我则笔直地立在厚厚的地毯上，兴奋得浑身发飘，心里明白好运开始了，那六十块“国币”大有增值的希望呢！